加快推动制造业高端化品牌化绿色化转型

□ 盛朝迅

调查研究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当前，我国制造业创新能力还不够强，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偏高，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尚不完善，必须依靠创新推动产业更好转型升级。应以制造业转型升级和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为主要目标，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业态创新、品牌创新和管理创新等手段推动制造业加快向高端化、品牌化、绿色化转型，提升产业的整体效益和综合竞争力。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工业国，形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总量规模大，参与国际分工程度高，在全球制造业中占据重要地位。目前，我国制造业总量规模全球第一，结构调整成效显著，竞争力和创新能力亦有明显提升。

经过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工业总体规模不断扩大，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不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2010年，我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为19.8%。到2015年，这一比重进一步上升至26.7%。

同时，我国制造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新一代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发展，2017年底，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提高至10%左右。高技术产业快速增长和占比的提高也是工业结构不断优化的重要表现，近5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保持在13%以上。部分先进制造业前沿领域表现也颇为抢眼，2017年工业机器人和新能源汽车产业同比分别增长68.1%和51.1%。

近年来，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快速增长，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从2008年的0.61%增加到2017年的1.1%左右，我国制造业技术水平持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尽管我国制造业发展取得了一系列可喜成果，但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有待解决。

一是有效需求不足，产能过剩矛盾凸显，产品供给不能完全适应消费结构升级的需求，需要提高供给侧对消费结构升级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二是“大而不强”问题突出，部分行业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缺失、产品质量不高；三是传统比较优势弱化、成本高企、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体制机制制约等问题突出；四是产业向中高端迈进受到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和新兴经济体“分流”的两头挤压，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难度正在加大。

为应对新一轮全球制造业竞争，切实提升我国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应把握发展机遇，不断提高制造业创新能力和基础能力，推进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推动制造业朝高端、智能、绿色、服务方向发展，培育制造业的国际竞争新优势。

一是全面提升工业基础能力。工业基础能力直接决定了产品的性能和质量，是建设制造强国的重要基础和支撑。但长期以来，我国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发展严重滞后，使我国制造业长期处于全球制造业产业链的中低端，成为制约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卡脖子”难题。必须加快实施工业强基工程，围绕向中高端发展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梳理出需要重点攻克的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等瓶颈制约，集中力量逐一突破。

二是促进重点领域实现突破。在加快发展智能制造方面，着力攻克关键技术装备，夯实智能制造基础，培育推广智能制造新模式，推进重点领域智能制造成套装备集成应用；在全面推动绿色制造方面，加快实施传统行业绿色改造升级，积极引领新兴产业实现高起点绿色发展，推进资源高效循环利用；在积极发展服务型制造方面，引导企业通过创新设计、供应链管理、全生命周期管理、总集成总承包服务等，延伸服务链条，促进服务增值；在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方面，重点支持轻工、纺织、机械等传统行业技术改造、共性技术研发和核心零部件国产化，推动传统产业内涵式发展，同时更好促进创新成果转化，推动实现清洁生产。

三是加强质量品牌建设。加强质量品牌建设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提升产品质量、改善服务、技术创新的过程。为此，要把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作为增强企业和产品竞争力的重要抓手，按照中央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部署，实施质量强国战略，开展质量品牌提升行动，支持企业提高产品全生命周期质量追溯能力。

四是推进各类要素融合发展。随着制造业智能化、网络化、服务化步伐加快，制造业与相关产业和要素深度融合，催生了更多引领制造业发展的新模式、新业态。为此，要把握“制造业+”发展趋势，按照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的新要求，促进各种要素深度融合，推动“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互联网、大数据”等产业加快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 关注产业变革新趋势

生产方式智能化　组织方式网络化　产业链条服务化　生产过程绿色化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深入，一些发达国家纷纷提出以重振制造业为核心的战略布局，全球制造业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并带来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组织形态的重大变革，全球制造业发展呈现出智能化、网络化、服务化、绿色化等新趋势。

一是生产方式更加智能化。随着“大物移智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信息化水平的普遍提高，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智能技术日益融入产品研发、设计、制造的全过程，推动产品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主要发达国家和跨国企业均把智能制造作为新一轮发展的主攻方向，一些跨国企业也纷纷加大对智能化改造、先进机器人研发的投入力度，传统制造加速向以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数字制造为核心的智能制造转变。

二是组织方式日益网络化。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推广普及，特别是互联网的应用发展，带来制造业生产方式的重大变化，也推动了制造业企业组织流程和管理模式的创新，内部组织扁平化和资源配置全球化成为制造业企业培育竞争优势的新途径。与此同时，网络发展带来的众创、众包、众筹、线上线下互动等方式，可以汇聚全球的创新资源为企业提供生产研发服务，网络协同创新方兴未艾。

三是产业链条服务化趋势明显。随着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程度不断加深，服务化已经成为引领制造业升级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是制造业向中高端迈进的重要标志之一。服务型制造日渐成为新的产业形态，推动制造业企业从单一产品提供商向产品与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变，产业价值链重心由生产端向研发设计、产品销售、品牌推广和售后服务等环节转移，推动全生命周期管理、总集成总承包、电子商务等新业态和新模式快速兴起。众多知名跨国公司的主营业务都已经实现了由传统制造向制造服务的转型。

四是生产过程加速绿色化。随着制造业发展与资源环境制约的矛盾日益突出，为实现资源能源的高效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主要发达国家纷纷提出绿色化转型战略和理念，“绿色制造”等清洁生产过程日益普及，节能环保、新能源、再制造等产业快速发展，并成为发达国家重塑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 应对产业发展新挑战

产能过剩矛盾凸显　关键核心技术缺失　传统比较优势弱化　转型升级难度较大

◢ 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

提升基础能力　促进重点突破　加强质量建设　推动要素融合

全国政协副主席辜胜阻：

实现创新驱动发展需财税政策助力

本报记者　孙昌岳

全国政协副主席辜胜阻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暨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建院4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表示，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需构建完备的财税支持体系。

辜胜阻表示，推进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一是要发挥大学创新源头的作用；二是要发挥科技型大企业的“龙头”作用；三是要坚持大开放，坚持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两条腿走路”，深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四是要构建高效、包容、面向创新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五是要激励吸引高端人才；六是要创建军民协同创新平台，加快形成军民融合型创新链、产业链。对此，我国迫切需要加大财税支持创新驱动发展的力度。

辜胜阻认为，首先要强化创新财税扶持政策的系统性，加强对潜心研究和创新的科研人员的税收激励，吸引并留住高端人才，让风险投资为核心技术创新“撑腰”，实现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的“双轮”驱动。

其次要坚持减税和补贴协同发力，特别是要多减税、少补贴，采取多样化的税收优惠政策，对补贴要“重申请、严监督”，实现事前、事后全过程激励，让高新技术企业“轻装上阵”。

再次要提高创新财税扶持政策的精准性，针对不同行业特征优化税收制度设计，降低企业研发失败带来的风险，并将研发活动的经济效益内部化，助力高新技术产业重点领域、重大专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同时还要降低减免税政策门槛，在不同规模、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之间优化配置资源，避免研发资源的闲置与浪费。让税收激励贯穿企业全生命周期、涵盖创新活动的每个阶段，激发广大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

撷英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马建堂——

更好发展数字经济应持续深化体制改革

数字经济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它呼唤新的管理协调方式，甚至是新的思维方式。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更好更快发展，需要不断更新理念、持续深化体制改革。

一是要更好地鼓励创新。发展数字经济，过去靠创新、现在靠创新、未来还是要靠创新，鼓励创新就是以解放科技人员的创造力为依归，不断消除科研项目立项、资金分配、成果结题、产权认定、成果转让等环节的繁文缛节和不合理规定，让科研人员的奇思妙想不断涌流，将思想转化为科研成果，让科研成果顺畅地转化，变为现实生产力。

二是要更好地尊重市场主体的主体地位。随着数字经济不断发展，信息的获取更为便捷，几乎人人都可借助互联网平台成为创新者、生产者，成为要素、资源的分享者、拥有者。信息获取的便利化，供给与需求联结的直接化，使得经济活动决策日益分散化。要适应这一深刻变化，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同时，切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调动市场主体创业干事的积极性，使市场进入更为方便、要素流动更为顺畅、产权保护更为严格。

三是要更加规范和严格地保护个人信息。数字经济就是利用数据和信息的经济。人们的身份信息、交易信息、行为信息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宝贵财富，也涉及群众财产安全、人身安全和个人隐私。对个人信息，既要利用，也要保护，两者都十分重要，都不可偏废。要加快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界定好个人信息的权利归属和保护要则。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　李钢——

做好服务业开放的战略和路径选择

201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了50%，标志着中国已经步入服务经济主导的时期。应该看到，在我国服务业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少问题。

在体制机制方面，我国服务业作为一个整体在体制改革过程中缺乏顶层设计层面的思考，各领域各部门自行设置体制机制，改革的进度深度广度参差不齐。因此，部分服务行业出现乱象，在一些领域形成了行业垄断，而在另外一些领域又形成了无序过度竞争的局面。

在服务业开放发展方面，各部门对开放本身的认识存在一些偏差，有开放不彻底、不到位，以及管理缺位、失位、错位的情况，也有立法滞后，相关细则、条例尚不完善的情况，部门之间与行业规制也没有形成有效衔接。

新时代，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意义十分重要。在服务业扩大开放的进程中，应选择好开放的战略路径。首先是采取对内优先开放的战略；其次要创新开放模式；再次要推进自主开放，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等；最后要进一步促进服务贸易在政策上和服务产业发展相协调，使二者在开放中相互促进，共同推动我国服务经济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益　青）

发挥生态涵养区功能关键要完善生态补偿机制

□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课题组

正常发挥生态涵养区功能的前提，是生态涵养区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且这种能力不断增强。近年来，一些生态涵养区发展能力明显减弱，发展后劲不足，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其生态涵养功能的正常发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课题组对京津冀地区的生态涵养区之一张家口进行深入调研，认为生态补偿机制不完善是制约生态涵养区发展能力进一步提升的重要因素。要实现京津冀建设生态修复和环境改善示范区的目标，就必须从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入手。

课题组研究认为，京津冀现行的生态补偿机制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补偿主体以中央政府为主，尚未形成多元化的补偿主体结构。政府补偿中以中央政府补偿为主(占九成)，地方配套资金占很小比重，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参与机制尚属空白，同时缺乏常态化的横向补偿机制。**二是补偿标准过低，尚未建立依据生态投入和运营成本确定补偿标准的机制。**当前，京津冀生态补偿多以项目为载体，缺乏可持续性；补偿标准过低，对补偿对象激励不足，而且不能随着成本和价格适时调整；区域内不同地区补偿标准差距悬殊。**三是补偿方式单一，尚未形成市场化的补偿机制。**补偿方式多以中央纵向补偿、项目补偿为主，缺乏基于生态资源交易的市场化补偿方式。

应该看到，现行生态补偿机制的不完善，其核心问题是没有处理好三个关系，即政府补偿与市场补偿的关系、直接成本与机会成本的关系、“输血”与“造血”的关系。正是由于在补偿主体、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等方面没有处理好这些关系，导致生态涵养区发展能力不足、生态涵养功能发挥不充分。

对此，应多措并举，有效完善京津冀生态补偿机制。

第一，完善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机制。政府在生态补偿方面应该发挥主导作用，应建立以中央政府补偿为主、地方间横向补偿为辅的生态补偿机制。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进行明确分工。中央政府应重点解决生态涵养区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主要包括提升基础设施及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以保证对生态涵养区生态补偿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因此，应提升中央对生态涵养区的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适度压减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地方政府应根据“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进行基于项目的横向补偿。要完善政府间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环境保护政策实施所形成的增支减收给予合理补偿，可采取项目补偿、政策补偿、资金补偿、智力补偿、技术补偿、实物补偿、对口支援等多种方式。

第二，完善市场运作的生态补偿机制。市场补偿是政府补偿的有益补充，是促进生态补偿机制实现有效运转的关键。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推进生态资源价值化，建立和完善碳排放权交易、排污权交易等市场化运作机制。另一方面，鼓励民间组织和个人参与生态补偿。此外，还要完善生态产品资格认证制度，采取对高质量生态产品高付费的方式，形成一种由消费者买单的生态服务付费机制。

第三，完善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机制。一是综合考虑投入成本、机会成本和服务质量来确定生态补偿标准。要综合考虑地区的发展阶段、地区补偿的承受能力和市场价格变化等，生态补偿上限应该考虑发展阶段和社会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补偿下限应至少能弥补生态保护直接成本；同时也要考虑生态涵养区为承担生态主体功能区的主要功能而丧失的经济发展机会可能带来的收益；还要根据生态服务质量来确定补偿标准。二是共建国家级生态合作试验区，区内统一补偿标准。建议河北的承德、张家口、保定山区，以及北京西部和北部、天津北部等生态涵养区，共同申请国家级生态合作试验区，通过生态补偿政策的先行先试，为全国生态涵养区发展探索新路子。比如，区内统一生态补偿标准，在护林、植树造林、稻改旱等方面率先实现区域内相关人员同工同酬。三是补偿标准应结合经济发展水平适时调整。生态补偿标准应该结合实际情况，考虑当期的经济发展阶段、居民收入水平和物价水平适时调整，提升补偿对象对生态建设和维护的积极性，以保障生态涵养区建设取得切实成效。

第四，完善培育“造血”功能的政策体系。增强生态涵养区的“造血”功能和为其直接“输血”同样重要，要通过生态补偿“输血”形成生态涵养区自我发展的“造血”能力。一是以产业投资提升生态涵养区“造血”能力。国家应加大扶持力度，支持在生态涵养区发展生态友好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京津冀地区可推动生态友好型产业（如文化创意、电子信息技术、新能源等产业）优先在张家口、承德等生态涵养区布局，增强其地方经济发展能力。二是将对贫困地区的援助政策与提升这些地方的“造血”功能相结合。张家口、承德等既是京津冀生态涵养区，又是生态脆弱区和环首都贫困地区，建议将生态涵养区的生态补偿政策与生态脆弱区、环首都贫困地区的援助政策有机衔接，形成合力。

（执笔：章　浩　祝尔娟　戚晓旭）

本版编辑　栾笑语